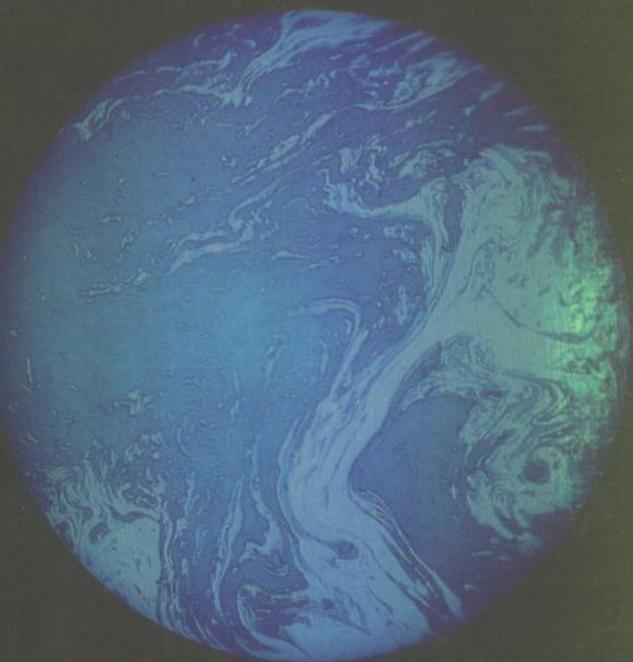


动荡中的历史抉择

——近代知识分子的追求

黎仁凯 著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动荡中的历史抉择

——近代知识分子的追求

黎仁凯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 新登字 01 号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动荡中的历史抉择
——近代知识分子的追求
黎仁凯 著 责任编辑 陈智英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新乡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字数 231000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215-02009-6/G · 261 定价：6.20 元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顾问	胡 绳	马 洪	任继愈
	张岱年	季羨林	汤一介
	冯 契	梁披云	
主编	许 明	刘春建	
常务编委	陈燮君	杨匡汉	
	俞吾金	汤学智	黄晓峰
编委	钟哲明	乔仁毅	姜 涛
	王小盾	陈晓明	谢维和
	房 宁	刘月莲	陈智英
总策划	赵 燐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总序

许 明

河南人民出版社组织的这套大型丛书接近完成的时候，将是本世纪的最后一二年了。作为编者，我们感到幸运的是，我们有了一个机会在充满风风雨雨的百年中国的一个转折点上，回顾和展望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艰辛的然而又是十分辉煌的路程。

应当说，在20世纪剩下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力图全面地在思想、学术、理论上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足迹，特别是近百年来，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动荡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探求他们在推动历史进步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是十分适时的。这不仅仅因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过去在理论上缺少相应的研究，从而削弱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的认定和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觉醒，而且也因为，我们深信，这项系列工程的展开是对百年中国文化运动的一次自觉的反省和展望。

五·四以来，苦难的中国在各种阵痛中终于迈开了向现代化前进的历史步伐。然而，或许是我们这个民族因袭的历史包袱太沉重，或许是客观的社会条件不允许，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路途，特别艰难和漫长。在这个过程中，一切进步的、爱国的、民族主

义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不在力图体现历史要求的同时又啮咬着自己的灵魂，急匆匆地锻造自己的“批判的武器”。历史没有准备一个成熟的经过现代社会洗礼的知识群体，恰恰相反，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背负着责任，探索着前进的。而80年代，所有这些内在的矛盾：历史要求与知识准备、文化传统与社会批判、政治理念与大众心理……都充分地暴露了出来。知识分子的敏感心灵又一次经历了深刻的洗礼。

在这个复杂的历史变动中，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选择的改造落后和分裂的中国的社会工程获得了初步成功——尽管经历了深重的坎坷和曲折。五·四时期诞生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一批朝气蓬勃的真正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热忱，深刻地影响和主宰了百年中国的社会生活的变革。然而，与“推翻旧世界”的历史任务不同，80年代所提出的历史要求是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建设一个经济一政治一文化的现代中国。所以，80年代文化与社会的变化、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的矛盾和困惑，对所有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讲，也都是全新的课题。

在沉重的历史负荷面前，素有“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不能无动于衷的。《中国知识分子丛书》将为有志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学者提供机会，研究在历史变革中知识主体的思想轨迹与社会功能，研究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心灵的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历程。从而在更深的层面上研究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担当起这套丛书编辑任务的是一群40岁上下的中青年学者，其中大多数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们经历过“文革”以及80年代的开放改革，与同时代人一样，经历了思想上的种种动荡和痛苦的反复。然而，他们执着地求索着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理性之路。有了80年代那段特殊的经历，就如他们的年龄所标志的那样，在思

想上开始走向成熟了，对现代中国来讲，一种沉稳的理性比之激情更为需要。清理极为复杂的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路程，提高到学术理性的层面上去认识一个社会文化的载体——知识者的社会价值与功能，是建设新文化所急需的。由此，本着“开放、求实、建设”的精神，我们祈望一切关怀当代中国命运的朋友们支持这项事业并提供意见，惠赐佳作。

到本世纪末，8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中青年学者将进入“知天命”之年，然而，有什么能比参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建设更能激起生命的热忱呢？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完成什么，但重要的是他们在做什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是为序。

1992年6月6日于北京钟鼓楼

前　　言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期间，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民为独立解放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时代。在这社会剧烈动荡、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复杂尖锐的年代里，最先冲破闭关牢笼走出中世纪、告别落后与愚昧的是知识分子，最早觉醒并走向世界的是知识分子，挺身站到时代潮流前面为救亡图存、振兴华夏而呐喊的是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呕心沥血设计理想社会的是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慷慨为国捐躯唤起民众的还是知识分子。回顾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每一次较大的历史变革，都回荡着知识分子的豪壮声音，都留下了知识分子的深深足迹。知识分子的奋斗史，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尽管他们分属于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从事的职业千差万别，具有不同的理想追求；尽管他们走过的路是多么曲折坎坷，但江河回九折、浩荡到东溟，由爱国而改革、由爱国而革命是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前进的主要趋向。先进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勇于肩负时代重担，用自己所学专长报效祖国，栽种了近代文明之花，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追寻他们走过的道路，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弘扬他们的爱国精神是一个十分值得认真

探究的课题。笔者在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中，每每为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拳拳爱国之心和奋斗精神所激励，使我鼓起勇气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这本小册子呈献给亲爱的读者，如果能对激励青年同志和当代知识分子报效社会主义祖国有所裨益的话，将是对我的最大鼓励和鞭策。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丛书编委会、河南人民出版社有关同志的鼓励支持、指导和帮助，得到了河北大学图书馆、历史系和马列教研部资料室的大力协助。谨致以诚挚的谢忱。由于笔者水平不高、加上时间仓促，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同行师友和读者批评教正。

黎仁凯

1992年1月

目 录

前言	(1)
一、从士大夫到近代知识分子	(1)
“士”与“士大夫”	(1)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阶段	(4)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	(12)
二、走出中世纪的士林经世派	(16)
龚自珍与经世思潮的激荡	(16)
林则徐辈开眼看世界	(20)
魏源的“三大主义”	(25)
爱国士大夫的襟怀	(31)
坎坷与迷茫	(38)
三、太平天国时期的知识分子	(43)
洪秀全改造上帝	(43)
冯云山紫荆创业	(48)
“天国”社会蓝图与实践	(51)
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56)
秀才献策	(61)
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政策	(66)

曾国藩及其幕僚	(71)
混进太平天国的反动文人	(78)
四、早期近代化的倡导者与谋士	(83)
奕訢集团倡导近代化	(83)
李鸿章的近代化纲领	(88)
左宗棠的爱国情操	(93)
张之洞与“中体西用”论	(99)
孤独的先行者	(106)
谋士与实干家	(114)
五、沐浴欧风美雨的新一代	(123)
新型知识分子的摇篮	(123)
首届留美学生的波折	(129)
早期留欧学生	(135)
报国初露锋芒	(141)
六、救亡与启蒙的先锋	(149)
变法救亡的呐喊	(149)
康有为重塑孔子与设计未来	(155)
舆论骄子梁启超	(162)
浏阳双杰与湘楚风云	(169)
启蒙思想家的奉献	(177)
七、迅速壮大的知识分子队伍	(186)
20世纪初的兴学热潮	(186)
飘洋过海求学	(193)
学生走向社会之后	(203)
璀璨的科技明星	(210)
八、在革命与立宪的道路上	(221)
孙中山的求索	(221)
民主革命宣传家	(229)

改良保皇与革命排满的论争	(236)
革命勇士慷慨悲歌	(241)
立宪派的失败选择	(250)
投笔从戎首义功	(257)
九、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	(262)
投身实业建设	(262)
力谋教育救国	(269)
封建文化的回流	(275)
倡导新文化运动	(280)
选择马克思主义	(286)

一、从士大夫到近代知识分子

“士”与“士大夫”

“知识分子”一词，虽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但知识阶层的存在却源远流长。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这个知识阶层一般被称为“士”。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变》一文中认为，“士”最初是武士，其身份相当于低级的贵族，它有统驭平民百姓的权利，也有保卫国家社稷的义务。商、周时代文献中提到的“士”或“庶士”，大体是指知书达理的贵族或执掌各种事务的中下层官吏。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大动荡、大变动，“士”逐渐转化为文士。当时，政治军事上各诸侯国争雄，相互兼并，私门养客之风甚盛，“士”作为诸侯的门客大展其所长；学术上儒、墨、法、道等学派林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是“士”的繁盛时期。当时的文士大多轻去乡邑，家乡和宗国的观念十分淡薄，乐于辗转游说，故又称他们为“游士”。

秦统一中国以后，中国逐渐形成了大一统局面，在政治上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同时，也要求思想方面与之相适应，

学派丛生、百家争鸣的局面已不利于中央集权的统治，四方游说的“士”也成了不利于统一的离心力量。因此，西汉以来，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之需要，封建统治者从提倡道家黄老无为思想逐步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开始成为统治中国人民的正统思想，儒学被尊为官学，其他各家被排斥于官学之外。官吏也大多从儒生中选拔，这些儒生和官吏便被通称为“士大夫”。

在我国古代文化典籍里，“士大夫”既可泛指一般士人，也可专指担任政府官职的官僚阶层。秦汉时期，“士大夫”主要充任“吏”和“师”两方面的职责。魏晋南北朝以降，佛教、道教逐渐兴盛，以至出现儒、佛、道三教并立的局面。一些道家名士、佛教高僧也成为知识阶层的主要代表者之一。隋唐的佛教领袖、著名的诗人文士，宋代的理学家与词人，元代的杂剧大师，明清的启蒙思想家与小说家，以及历代重要的发明家、科学家都各领风骚，成为不同时代知识阶层的代表者。总之，“士大夫”的涵义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有所演变，但一般是指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和声望的读书人，它包括官僚阶层、军士将佐、绅士及普通文人士子。自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后，选拔官吏的社会层面扩大了，读书、应试、入仕成为知识阶层的进身之阶，科举成为他们争趋的利禄之途，不少读书士子为此而奋力拼搏乃至老死文场而无憾。早在唐太宗时代，就有人作诗评论科举制度：“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①可见，科举制度是笼络知识阶层的诱饵，也是禁锢他们聪明智慧的牢笼。“士大夫”地位之高下，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科举所得的功名，得之则荣，失之则辱，真是“天上人间一霎分，泥涂翘首望青云。”^②所以，在科举制度下，

① 《唐摭言》卷 1。

② 《历代小说笔记选》（清）第 4 册第 957 页。

追求功名的读书人，承担传授文化任务的塾师，科举入仕后做官或准备做官的人以及离职退休后的绅士，均可称为“士大夫”。近代知识分子的初生形态便是从“士大夫”转化而来。

追寻中国封建士大夫走过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它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传统特色和相伴而生的痼疾。

首先，中国的士大夫对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优越感。他们以儒家学说为核心，虽也兼采道家、法家和佛学等学说，但他们的知识结构基本上是以经义说教为主，他们治学也在于阐释先代圣贤的经典，坚信靠半部《论语》即可治理天下。科举取士制度又以法律形式框定了他们的知识范围，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在士大夫中没有其地位。甚至到了近代，仍被顽固士大夫斥之为“奇技淫巧”。华夏古老文明的先进地位，滋长了他们的自诩心理，在封闭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逐渐形成了华夏文化至上的“天朝”观念。到了近代，这种观念成了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和向西方学习的严重思想障碍。

其次，中国士大夫以行道、卫道为职志，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时刻不忘“以天下为己任”，崇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哲学，具有改革社会的理想抱负。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警语，被无数士大夫作为座右铭，已发展成为士大夫高尚的道德传统和中华民族可贵的民族精神。

再次，中国士大夫与官相结合，紧紧依附于封建皇权，具有极强的参政意识。“学而优则仕”是士子的奋斗目标，也是天经地义的信条。一部分学业优长的士子通过科举入仕成为官吏，效忠于封建皇帝；另一部分科场落第的士子也往往投靠封建衙门，成为各级官员的幕客，替他们出谋划策，管理刑名、钱谷或文书，也同样与封建官僚相结合。在古代中国，士大夫若不与官方相结合，不仅不能显达，而且很难有所作为。

复次，中国士大夫历来重名节，讲骨气，有可贵的献身精神。常言说：“士为知己者死。”诸葛亮为报刘备“三顾茅庐”之恩，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刘备开创的蜀汉事业，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历代视死如归的爱国士大夫不胜枚举，明代爱国英雄于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①的高风亮节，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②的高尚情操，已被爱国士大夫奉为圭臬，它激励着无数士大夫前赴后继，为国为民而英勇献身。

最后，中国士大夫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良心”。一般士大夫都受过儒家“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的影响，主张君王要实行仁政，要得民心。许多中下层士大夫同民间百姓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们了解民间的疾苦，如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长期过着忧伤痛苦的生活，对人民的苦难有切身的体验，大胆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穷奢极侈，唱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写出了《三吏》、《三别》等反映人民苦难的诗章。宋代著名清官包拯，刚正不阿，为民请命，不怕权势，执法如山，曾七次上奏弹劾仗势残害百姓的大官僚王逵，终于迫使宋仁宗免去了王逵的官。在历代士大夫中，为民请命者比比皆是。明代海瑞就是突出的代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本阶级的属性而代表了“社会良心”，这是中国士大夫的优良传统之一。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阶段

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闭关自守的大门被打开，也揭开了近

① 于谦：《石灰吟》。

② 文天祥：《过零丁洋》。

代史的帷幕。从此，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乃至思想文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列强一方面侵夺中国的领土，践踏中国的主权和尊严，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富，迫使中国人民处于受掠夺被奴役的地位；另一方面，它们又通过种种渠道向中国输入先进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思想文化，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未曾闻见的新东西。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双重挑战面前，具有极强社会责任感的中国士大夫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他们出自民族情感和爱国热忱，倡导“经世致用”，表现了很强的参与意识和入世精神；他们被迫走出中世纪，开眼看世界；他们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倡办洋务，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他们不断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提出过种种建国方案；发动了变法运动、革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途中，知识分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综观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八十年间知识分子走过的路，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战争。这是一部分开明士大夫被迫走出中世纪，主张向西方学习并开始向近代型知识分子转化的时期，也是第一代新式知识分子诞生的时期。第二阶段从1895年维新运动兴起至1911年辛亥革命直至清王朝的灭亡。这是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也是他们走向政治舞台、对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作用的时期。第三阶段从1912年辛亥革命失败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发展壮大，迷茫、困惑，进行历史反思和重新选择的时期。

在第一阶段中，对近代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有三类知识分子。

第一类是封建官僚士大夫及他们的幕客，包括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经世派，也包括从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或新崛起的洋务派官僚，如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还